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新自由主义生态危机批判^{*}

刘永凌 李连波

[内容提要] 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生态危机的可能性自人类社会出现后就产生了,但全面的生态危机只有在资本主义阶段才具备了现实性。作为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定发展阶段的新自由主义则进一步加剧了生态危机。新自由主义以市场机制为中心的解决方案无法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有效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反而受资本逻辑的束缚为资本逐利开辟了新的空间。虽然社会主义是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的唯一出路,但当前我们需要认清现实情况的制约,以便更好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稳步前进。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新自由主义 生态危机 资本主义

DOI:10.16502/j.cnki.11-3404/d.2019.05.006

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新自由主义招致了许多非正统经济学者的激烈批评,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深刻揭露了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实践所造成的多重危害。危机爆发后,“以新自由主义挽救新自由主义”的应对政策非但没有使美国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反而使其深陷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多重危机的泥潭。对于前几种危机形态与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实践之间的联系,目前已有大量文献进行探讨,对新自由主义与生态危机之间联系的考察则相对较少。本文意图表明,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作为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定发展阶段的新自由主义则进一

步加剧了生态危机,这可以从其经济实践、经济理论、意识形态和解决方案的角度进行说明。

一、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起源

尽管还存在一些争论,但过去 30 多年全球已经形成一个普遍共识,即人类正面对严重的生态危机,如果应对不当,甚至可能会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以气候变化为例,自工业革命以来,煤炭、石油等得到大规模的使用,这种以化石燃料为驱动

^{*} 本文系 2016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项目编号:16ZDA002)的阶段性成果。

的传统增长方式,在使经济、科技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大量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对人类赖以生存的气候环境的稳定性产生了恶劣影响。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指出,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人类对化石燃料的使用是温室气体浓度上升的主要原因。这种由人为因素所导致的全球气温上升对自然和生物系统产生了重要影响,未来气候变化问题仍将持续存在,并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到整个生态系统,不仅会对人类的居住环境和健康产生严重影响,更会危及全体人类的生存。“科学研究正在不断地告诉我们: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即使持续一个世纪,地球及其居住者的结果将是这个世界的崩溃。……在气候和生态系统中催生巨大变化,将无数人和不计其数的物种置于危险当中。”^①

事实上,生态危机对资本主义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而是伴随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向全球扩张的每一个阶段。更一般地说,生态危机的可能性自人类社会出现后就产生了,但全面的生态危机的现实性只有当资本主义制度出现后才产生。这是因为人与自然界的特定关系受社会形态的制约,在人类社会产生之初人还只能像动物一样服从于自然力,对自然界的的影响十分有限。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这里立即可以看出,这种自然宗教或对自然界的特定关系,是受社会形态制约的,反过来也是一样。”^②当然,与动物不同,人一开始就通过有意识的实践活动给自然界打上了自己的印记,干预了自然界的演化过程,使生态危机具备了可能性。“如果说动物不断地影响它周围的环境,那末,这是无意地发生的,而且对于动物本身来说是偶然的事情。但是人离开动物愈远,他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一切动物的一切有计划的行动,都不能在自然界上打下它们的意志的印记。这一点只有人

才能做到。”“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③其中,劳动发挥了关键作用,“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④。

虽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之前,人类通过劳动实践不断改变自然,使生态危机具有了可能性,并且局部的生态危机也确实偶有发生,但全面的生态危机的现实性只有当资本主义制度出现后才产生。美国著名的环境史学家杰森·摩尔(Jason W. Moor)的研究证实了这点,他指出,21世纪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现代早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决定性的转变,而且标志着世界生态的根本性重组,它使封建时代地方化的生态问题上升到新陈代谢断裂的全球性问题。^⑤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其深层原因有两点: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极大发展,特别是工业革命的进行,使人类具备了“战胜自然”的物质基础。“只有人才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变更了植物和动物的位置,而且也改变了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的面貌、气候,他们甚至还改变了植物和动物本身,使他们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死亡一起消失。而人之所以做到这点,首先和主要的是由于手。甚至直到现在都是人改造自然界的最强有力的工具的蒸汽机,正因为是工具,归根到底还是要依靠手。”^⑥除了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也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对自然规律认识的增加极大地提高了人对自然的反作用。

① [美]约·贝·福斯特《生态革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卷第34—3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0卷第517、51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2009年版第207—208页。

⑤ 参见[美]杰森·摩尔《地球的转型——在现代世界形成和解体中自然的作用》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0卷第373—374页。

第二,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进步被用于为资本家榨取利润服务,资本无限积累的欲望推动资本扩张到全球每一个角落,丝毫不顾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必然会产生异化的结果,“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可分离的矛盾和对抗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如此等等”^①。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已经从资本追求无止境复合增长的欲望中,预见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发生的必然性。

以上分析从两个较为抽象的层面说明了生态危机的可能性和全面的生态危机的现实性。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在马克思的分析基础上,结合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演进,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他们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不再是使用价值的消费,而是被异化为财富在价值形态上的积累,前者在数量上是有限的,遵循适可而止的原则,能够维持经济生活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平衡,后者的逻辑则是贪婪不止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必须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地开发自然,这样才能维持获取利润的能力,当下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的现状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地球物质和能量循环的干扰和破坏已超出地球的承载能力;资本积累的不断扩大引发了地球物质和能量循环的“新陈代谢断裂”,这种断裂以破坏生产条件的形式反馈至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引起其生产条件与生产方式的“第二重矛盾”。^②福斯特将激进的环境社会学家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吸收总结为以下三点:一是踏轮磨坊式的生产方式,即将资本主义描述为一个永不停止、不断提速的踏轮磨坊,不断增加能量和原材料的生产规模,以满足其利润和积累的需要,因此不断地对地球的承受能力施压;二是资本主义的第二类矛盾,指资本主义会破坏经济发展所依赖的环境条件;三是新陈代谢断裂的

观点,指资本主义的积累逻辑在社会和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过程中无情地产生了一种断裂,切断了自然再生产的基本过程。^③

二、新自由主义与生态危机

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反生态的,资本逻辑占据主导的社会经济发展必然以破坏自然环境为代价,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问题。作为资本主义最新发展阶段的新自由主义试图通过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改革,扫除资本在国内逐利的一切障碍,同时为资本的国际流动清除障碍,促进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其结果是新自由主义将资本的触手伸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扩张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追求无限增殖的欲望超出了地球的承载力,对生态环境产生了灾难性影响。

新自由主义造成了严重的环境后果,这一点已经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遍承认,“自1970年左右以来环境破坏正有加剧趋势。已经有足够多的具体事例支持这一总体论断,表明无限制地推行新自由主义原则带来了环境损失。1970年以来日益加剧的热带雨林破坏是众所周知的例子,已经对气候改变和生物多样性丧失产生严重后果。新自由主义化的时代,也恰逢地球近期历史中最快速的大规模物种灭绝时代。如果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非常危险的地带,全球环境(尤其是气候)急剧变化以致使地球不适于人类居住,那么进一步拥护新自由主义伦理和新自由主义化实践将无异于自取灭亡”^④。对于新自由主义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具体联系,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从其经济实践看,新自由主义以“自由”之名释放了资本逐利的天性,松开了资本逻辑的缰绳,从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强化了人类对自然界的干预。新自由主义高举自由旗帜,目的只是为了让资本能够自由逐利。有学者指出:“把自由仅仅理解为‘不受任何限制地花钱做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2009年版第508页。

② 参见谢富胜等《全球气候治理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

③ [美]约·贝·福斯特《生态革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9页。

④ [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181页。

切想做的事’ ,已经成为全球气候危机的主要原因。”^①在深度方面 ,为资本积累开辟新疆域的私有化、商品化和市场化进程不仅完全占领了公共部门 ,还日益广泛地渗透到家庭和个体生活领域 ,将家庭和个体作为榨取利润的目标 ,造成了日常生活的金融化。^②新自由主义试图将人类共有的自然资源彻底私有化和商品化 ,并进入到了许多资本之前并未涉足的领域 ,“通过世界贸易组织中的所谓知识产权协议(TRIPS) 建立起来的知识产权 ,规定基因材料、物种血浆 ,还有各种其他产品都属于私有财产。于是 ,人们就可以从大众那里攫取租金 ,而大众的实践活动在这些基因材料的发展上曾经扮演过重要角色。生物剽窃现象相当猖獗 ,而窃取世界遗传资源储备库的行为也很普遍 ,为的是满足一小撮大型制药企业的利益”^③。在广度方面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为资本的跨国流动扫除了障碍 ,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全球资本循环的链条之中 ,使资本逻辑在全球范围内得以展开。

第二 ,从其经济理论看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开始就完全忽视了生态因素的社会价值 ,将经济利润放在优先地位 ,只有当环境恶化影响到经济增长时 ,才开始关注环境问题。长期以来 ,西方主流经济学一直将生态因素排除在经济分析之外。拿主流经济学的生产函数为例 ,它解释了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 ,但是在投入品方面并没有区分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 ,认为二者是替代品。主流经济学之所以接受这条不符合实际的假定 ,是因为这条假设剔除了生态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限制。“索洛 - 斯蒂格利茨生产函数假设人造资本可以替代自然资本。因此 ,只要人造资本可以再生 ,增长就没有限制。……经济学家们却继续沿用索洛 - 斯蒂格利茨生产函数 ,因为这个函数剔除了生态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限制。现代经济学已经把经济增长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 ,正如自由贸易也已经成了一种意识形态。”^④即使在处理环境问题时 ,主流经济学也主要从成本 - 收益的角度考虑气候变化的影响 ,认为地球气候的大幅变化在经济方面产生的变化非常微小 ,对世界产量几乎没有影响。因此 ,主流经济学家倾向于不采取实际行动或采取缓慢的行动 ,倾向于提高适应能力 ,而非放缓经济增长速度 ,认为通过有效率的市

场而实现自然资源的技术性替代方案是唯一答案。^⑤

第三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 ,新自由主义掌握了关于生态、环境和治理的一套话语 ,用于为资本逐利服务。哈维认为 ,有关环境、人口和资源的观念并非中立的 ,而是具有政治上的起源和后果 ,当代环境争论中使用的许多术语都无意识地融入了资本主义的价值 ,“有关自然的话语把来自社会过程的所有其他环节的一整套矛盾冲动和冲突观念都内在化了。……统治集团以难以置信的热情试图包容、塑造、迷惑并搞混当代有关自然和环境的争论。……占统治地位的权力系统能够提出并保护一种霸权话语 ,这是一套对资本积累来说充分有效又合理的环境管理和资源配置的话语(在某种程度上 ,甚至依据那种话语创建了政策、制度和物质实践)”^⑥。资本之所以要夺取环保运动的领导权 ,是为了生态话语的支配权 ,以自己的方式定义自然——通过货币化方式和成本收益分析 ,从而以符合资产阶级广泛利益的方式处理资本与自然之间的矛盾。^⑦

根据哈维的理论 ,新自由主义阶段建立起“灵活积累”体制 ,劳动力过程、劳动力市场、产品和消费模式更加灵活 ,并出现了全新的生产部门、金融服务方式和新的市场。资本主义的创新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 ,新的产业在旧的废墟上建立起来 ,新旧交替之间必然会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此外 ,灵活积累体制需要进一步激发人们的消费欲望 ,鼓励个性化的消费需求 ,从而为其产品

① [美]菲利普·克莱顿、[美]贾斯廷·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12 页。

② 参见李连波《新自由主义、主体性重构与日常生活的金融化》,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 年第 3 期。

③ [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67 页。

④ [美]保罗·克雷格·罗伯茨《放任资本主义的失败——写给全世界的新经济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年版第 37 页。

⑤ [美]约·贝·福斯特《生态革命》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7 页。

⑥ [美]戴维·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98 页。

⑦ 参见[美]大卫·哈维《资本社会的 17 个矛盾》中信出版集团 2016 年版。

创造销路。“灵活积累在消费方面已经伴随着更加密切地关注快速变化着的时尚、调动一切引诱需求的技巧和它们所包含的文化转变。”^①新自由主义大力宣扬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资本有系统地缩短消费品的周转时间,手段包括生产不耐用的商品,强力推动商品按计划报废(有时甚至是实时报废),快速创造新产品线(例如近代的电子产品),动员时尚和广告的力量,强调新的有价值、旧的很寒酸。近两百年以来,资本一直在动用这些手段,过程中造成巨大的浪费。”^②

三、新自由主义生态危机解决方案及其局限

气候变化是新自由主义生态危机的一个典型方面,受到全球广泛关注。气候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因此气候变化问题进入了主流经济学家的研究视野,减少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然途径。20世纪80年代,以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为主的经济学家最早关注到了气候变化问题,并开展了一系列的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提出并利用动态综合气候经济模型(Dynamic Integrated Climate - Economy Model, DICE)以及区域气候和经济综合模型(Regional Integrated Model of Climate and the Economy, RICE),比较不同国家之间的减排成本,从减排效率方面进行了研究。诺德豪斯认为,发达国家减排成本较发展中国家高,应延缓其减排行动,或者让发展中国家进行减排,这样更有效率。^③但是,诺德豪斯的研究仅关注到了减排成本,并没有考虑到气候风险问题。气候变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延缓减排可以带来成本上的降低,这虽然符合经济理性,但温度上升可能会带来不可逆的风险,使得社会经济系统崩溃。考虑到这一问题,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对诺德豪斯的方法作了改进,将气候风险纳入模型,引入减排贴现率,认为尽早采取减排行动,能够大幅度降低未来气候风险产生的损失。^④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是其制定解决方案的基础。在主流经济学看来,气候变化是一个由经济活动带来的负外部性问题,

这一负外部性的存在为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提供了正当理由。基于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这种外部性的判断,目前主流经济学给出了基于市场的解决方案:碳税和碳市场。碳税是一项价格政策,其基础是政府直接给碳定价,即对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课征碳税,使得碳排放具有一定的成本。这使企业或者生产者在使用化石能源等产生排放碳的要素时,会考虑这一成本因素。这样便形成了一种价格激励,从而降低这些原料的使用和消费,进而减少碳排放。碳市场则是一项数量政策,其基础是碳排放权的合理界定和分配。政府利用强制力,通过立法等手段,划定碳排放总目标,并通过向企业分配这些总量,使碳排放配额进入市场,在市场交易的过程中实现碳定价,而并非碳税那般直接由政府定价。^⑤许多主流经济学家笃信市场机制是环境保护的最佳方式,“市场机制能够为保护自然生态系统提供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我们有理由相信,市场机制同样能够解决环境保护的问题”^⑥。

无论是碳税还是碳市场,本身都不是减排手段,而只是一种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实现既定减排目标的市场化机制。因此,如果全球碳排放总量导致的温度上升超过《巴黎协定》议定的2℃目标,作为一种有效的补充手段,地球工程等技术方案就会发挥重要作用。地球工程是人类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对地球环境和气候进行干预而采取的大规模的人工技术和方法的总称,分为碳移除(Carbon Dioxide Removal, CDR)、太阳辐射管理(Solar Radiation Management, SRM)两大类,

① [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1页。

② [美]大卫·哈维《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261—262页。

③ See William D. Nordhaus, “The ‘DICE’ Model: Background and Structure of a Dynamic Integrated Climate - Economy Model of the Economics of Global Warming”, Cowles Foundation Discussion Papers 1009, Cowles Foundation for Research in Economics, Yale University, 1992.

④ See Nicholas Ster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i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8, No. 2, 2008, p. 37.

⑤ 参见石敏俊等《碳减排政策:碳税、碳交易还是两者兼之?》,载于《管理科学学报》2013年第9期。

⑥ [美]杰弗里·希尔《生态价值链:在自然与市场中建构》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9页。

两类又分别包含不同的技术和方法。^①其中,碳移除旨在通过包括海洋施肥、土地利用管理、碳捕获与封存(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CCS)、生物能源碳捕集与封存(Bioenergy with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BECCS)等人工手段减少碳排放或移除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太阳辐射管理旨在通过影响太阳辐射为地球“直接降温”,主要包括平流层注射硫酸盐气溶胶、设置太空反射镜,以及海洋云层增白、屋顶涂白、沙漠绿化等改变地表反照率的方法技术。

以诺德豪斯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给出的理论解释和解决方案招致了诸多指责,不只是马克思主义者,在主流经济学内部也存在较多争议。

第一,对气候正义的认识存在分歧。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由发展中国家承担减排任务的效率更高,这种考量缺乏公平。实际上,在气候治理问题上,发展中国家受到了发达国家的双重剥削。“发展中国家为了抓住经济增长的机会,不得不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降低环境标准,也承接污染转移,为发达国家提供廉价商品,遭受‘第一重环境剥削’。当生态危机的形势愈发严峻之时,发达国家主张‘双轨谈判’,要求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共同减排,发展中国家出于自身环境污染压力以及减缓气候变化的迫切性,提出国家自主贡献,签署《巴黎协议》,实际上帮助发达国家分担了碳减排成本,进而遭受‘第二重环境剥削’。”^②不仅如此,国际资本还通过碳交易和补偿机制建立起一套“碳殖民主义”体系,在国际政治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资本主义以气候治理为手段的剥夺性积累带有帝国主义的特征,跨国资本依仗全球性的碳市场,以气候治理为由从不发达国家获利,向不发达国家排污。^③因此,有学者建议采取碳预算方案,采用人均历史累积排放的分配方案,全球范围内各个国家平均分配碳排放量,共同减排。^④

第二,市场手段没有摆脱资本逻辑。新自由主义两种以市场为基础的解决方案都在试图维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然而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果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就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生态危机。^⑤只要资本主义制度仍然存在,资本主义企业就必然以追求利润为目标,持续不断地进行资本积累。资本主义企业绝不会

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而放弃逐利。此外,新自由主义在环境问题中开辟了新的谋利空间,许多经济学家之所以支持这些治理措施,是因为它们创造出了新的市场和新的积累手段。^⑥“在金融化的时代,应对环境恶化的行动本身也成了交易的对象。通过碳交易来应对碳排放污染的方案就是很好的例子。这种‘总量控制和配额交易’的方案给排放设置了上限,但也让那些污染没有达到上限的企业可以把它们所谓的‘剩余量’卖给其他污染者而让后者可以加大污染。这种方案之所以能够越来越受欢迎,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污染权可以被打包成证券交给投资银行来通过交易获利,这能比实际减排带来的利润更高。”^⑦因此,在资本逻辑的控制下,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只是空谈。

第三,技术手段存在道德风险和“杰文斯悖论”。碳移除技术中土地利用管理、碳捕获与封存、生物能源碳捕集与封存等技术都在实践中逐步成熟,且拥有较大的应用前景。然而,海洋施肥的争议较大,有学者指出向海洋中倾倒铁粉,促进浮游植物生长,可能会对海洋生态环境带来不利影响,《生物多样性公约》已明确禁止该技术的使用。^⑧与碳移除技术相比,运用太阳辐射管理来降低全球平均温度的方法可能会转移人们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其他负面影响(如海洋酸化)的注意力,从而引发一系列的“道德滑坡”——罔顾其他危害,只求快速解决温度问题,增强了人们对“技术解决”环境问题的盲目依赖,以为总会有新的

① 参见陈迎、辛源《1.5℃温控目标下地球工程问题剖析和应对政策建议》,载于《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17年第4期。

② 乔晓楠、何自力《理解〈巴黎协议〉——一个产业变迁与碳排放的双层分析框架》,载于《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3期。

③ 参见谢富胜等《全球气候治理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

④ 参见潘家华、陈迎《碳预算方案:一个公平、可持续的国际气候制度框架》,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⑤ 参见陈学明《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

⑥ 参见[美]约·贝·福斯特《生态革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⑦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56—157页。

⑧ 参见王敏等《〈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关系》,载于《生物多样性》2014年第4期。

更好的“技术”来解决任何问题。^①更重要的是,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通过著名的“杰文斯悖论”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下靠技术手段解决生态危机的不可能性。即使技术进步提高了能源和资源的使用效率,但积累的进一步扩大给生态环境造成了更大的压力。福斯特认为,如果将地球工程作为应对全球变暖的主要策略,而将结束资本积累放在次要位置,那么人类将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这类行动会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带来巨大的负担,对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现存物种造成巨大威胁。因此,唯一理性的选择是进行长期的生态革命,以尽可能快地减少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为目标,努力恢复全球生态系统。同时进行广泛的社会重构,改变现有的生产方式,彻底变革人类与地球以及人类之间的关系。^②

四、超越新自由主义:必然性与现实性

虽然自人类社会产生以后,通过人类实践对自然的干预,已经产生了生态危机的可能性,但全面的生态危机只有在资本主义下才具有了现实性。作为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定发展阶段,新自由主义在过去40年充分释放了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性,将资本逻辑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和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引发了包括生态危机在内的一系列社会危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将生态因素系统排除在经济理论之外,只有当生态问题阻碍经济发展的时候才提出了以市场机制为中心的解决方案,但也只是为资本开辟更多的逐利空间。

本文的分析表明,生态危机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因此,应对生态危机,不仅要反对新自由主义,更要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生态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内在统一的。正如福斯特指出的,生态问题的症结在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文明进程已经到达终点,社会主义才是未来前进的方向。“一方面,可持续性、生态匮乏和人口过剩等概念都同资本逻辑深深地纠缠在一起,我们绝不能由于接受资本逻辑而限制自己选择。另一方面,我们不可能回避改造资本主义生态体系这个难题,在这个体系中,货币循环和剩余价值的榨取已经成为主要的生态变量。因此,任务是定义一种特殊的生态社

会主义规划,并为之奋斗,把我们从资本主义通过其非常明确的生态规划而生产出来的特殊社会压迫和矛盾中解放出来。”^③社会主义一开始就不奉行资本逻辑,为生态文明奠定了制度前提。在社会主义下,“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④。

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抛弃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是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的唯一出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认清现实情况的制约。在当前阶段,新自由主义依旧大行其道,资本逻辑仍然占据主导,我们非但不能与资本采取简单的决裂态度,反而还需要利用资本,“当消除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这一目标需要人类与资本逻辑决裂之时,其他的目标或许还需要进一步实施资本逻辑。具体地说,当今人类除了急需摆脱生态危机之外,还有着继续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实现现代化的既定目标,而为了达到这些目标,现实告诉人们必须选择市场经济的道路,选择市场经济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选择资本逻辑,即使经济的运行按照资本的逻辑展开”^⑤。

[作者单位]刘永凌,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

李连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责任编辑:文渊]

① See Mark G. Lawrence, “Was Breaking the Taboo on Research on Climate Engineering via Albedo Modification a Moral Hazard, or a Moral Imperative?”, in *Earth's Future*, Vol. 5, No. 2, 2016, p. 136.

② See John Bellamy Foster, “Making War on the Planet: Geoengineering and Capitalism's Creative Destruction of the Earth”, in *Monthly Review*, Vol. 70, No. 4, 2018, p. 1.

③ [美]戴维·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22—22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2009年版第928—929页。

⑤ 陈学明《谁是罪魁祸首——追寻生态危机的根源》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5页。